

你是怎么失去机会的

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我没背景和靠山;因为我颜值不够;因为我老实不会来事儿拍马屁什么的。告诉你,都不是,就是你尚未意识到的陋习让你直接出局,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不靠培养,靠筛选,你没活到第二集。你尚未意识到的陋习,还都是一些小事,比如迟到,有人就是喜欢迟到五到十分钟,你自己觉得没什么,有人还比我晚到,但你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不严谨;再比如大嘴巴心里存不住事,不分场合地巴拉巴拉,一件事还没做,已经世人皆知;又如自恋,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必须占C位;或者非常情绪化,秒变愤世嫉俗的差评师,需要别人小心翼翼;等等。以上这些都会让人感觉无法对你委以重任。这并不是小题大做,一般能给别人机会的都是有点建树的人,这类人的共性就是标准偏高,眼光挑剔,还会因为比这更小的事放弃你,比如抢

张欣



梦里回家

钟世秋

梦里,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我回到了上海的家——那座熟悉的法式花园老洋房。捧着一杯咖啡,坐在落地窗前,凝望着花园里那棵高大的玉兰树,静静地我发起了呆。

1936年由法国人种在花园里的玉兰,如今早已枝粗叶茂。春雨过后,树上开出硕大的白色花朵,花香弥漫在湿润的空气中,仿佛时间也在香气中悄然凝固。我沉浸在这个梦里千回,每一次,都是那窗,那房子,那玉兰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篆刻) 王大陆

朴拙的力量

唐子农

格外地宁静,而宁静对于临写古帖的碑拓尤为合适。那年冬季,家门口的老树,木叶萧萧,虬枝苍苍,天空上一轮圆月,这种画面自然让我联想起东山魁夷的那幅《冬花》。那个年代,学习书法的资料很少,居住乡村的我,获观朱复老的大草字帖,深深被其沉着刚健的注释小字所吸引,反复观看,反复临写,在一定程度上,执着总是有它的好处。忽有一天,在书店见到了傅山等明贤豪放派书法,更购得不少魏碑日拓。往后的日子里,意气风发,乡野的本性得以纵横驰骋。忽有一夜,兴来想作书,而百纸早已在前几夜挥霍一空。无奈之下检出废纸,于每纸的空白间,小心裁出小条条,然后细心拼接,竟拼得一卷。于是在小台灯下,取朱彝尊诗集,静静地抄写。一月下来,竟得小楷一卷。

乡村旧居终究还是被拆迁了,老墙壁、石路、老树,连同它那田园的宁静,一并消失。周遭的热闹已是无法抵挡了,只有在深夜的台灯下,磨墨抄写,偶有想起老屋、老树上的圆月,想起过去安静的抄写。那是何等的快乐时光啊。回忆间,似乎握着抄写的小笔,也如同紧握着那份朴实而宁静的温馨。

话、不懂得倾听、求人办事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一点还人情味的意识,凡事有头没尾、毫无交待等都会给人不靠谱的印象。

有人会觉得做人如此周全未免太累了,新的时代不是应该张扬个性我行我素吗,可是朋友,优秀的品质与习惯同样是个性,是一个人身上无形的勋章。想一想一个人再有才华但是浑身毛病,只要放在群体里就各种不适,需要别人无底线地包容,这样的人你喜欢吗?所以说人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是从改变世界的宏愿开始,发现自己的毛病和短板,努力克服陋习慢慢进步。所以才说自省永远是人生的导师,我们只有一点一滴地完善自己,所谓的幸运之神才会光顾降临。

我们的问题是感慨之余没有行动,对待自己完全没有要求,所以才会与大大小小的机会擦肩而过。

师张大千与李秋君的故居,斜对面住着的周家伯伯是出租车大王周祥生。我和邻居小伙伴们常在“中国照相材料大王”何其善家的花园里踢毽子,有时候还会跑去交大老校长程孝刚的家里摘枇杷吃。年少不经事的我就这样在这片街区里,在弄堂的阳光和玉兰花下,慢慢长大。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医生。那个年少轻狂的我,像一只桀骜不驯的小鸟,渴望飞得更高更远。我告诉自己,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要用我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空。于是,三

15岁时的我是个迷惘的少年,总是游荡般孤独地在乡村的风景中游荡。我会经常在傍晚时分越过河堤走向河滩,去河里摸鱼。当我摸完鱼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河堤上各色各样的大树小树也已经黑了。有时我会坐在河堤上的那棵老樟树下,目睹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冒出来,那时,夜露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是多么地细腻,树根也在缓慢地往土地的深处延伸,我就想着我生命的骨节也如树枝一样生长。那个深秋的日子很冷,朔风吹裂了我的嘴唇,寒冷深秋的傍晚下河摸鱼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我必须这样做,第二天一早学前拿到镇上的市场去卖,换些买书的钱。我回家经过河堤的时候,发现那棵老樟树上吊着一个人,月光照出了那人的轮廓,那是个女人。

十五岁那年,我为一睹偶像张国荣的风采,冒失地闯入了《风月》的拍摄现场。在重重人影与器材的缝隙间,真正攫住我呼吸的并非偶像的面容,而是导演陈凯歌说戏的姿态和低沉而有力的声喉。他赋予这个民国上海故事以奇异的海派音调,陈凯歌站在一片略显晦暗的光影里,声音不高,却像一根无形的丝线,瞬间勒紧了整个空间里所有浮动的空气。他对着张国荣和巩俐,目光灼灼,仿佛能穿越时空,直抵角色灵魂深处正在挣扎的幽微。那一刻,少年的我像被施了魔法,完成了一次许愿,要从“影迷”向电影导演进发的少年梦。一场戏很快拍完,张国荣送了我一张手持沙龙烟极其潇洒的签名照。这张签名照竟带着宿命的灼烫,烫穿了我混沌的年少时光。正是这隐秘的电流,日后推着我走进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一头扎进了光影编织的无边迷途。

多年后,我竟也站到了摄影节的开幕影片,舞剧电影《永

虽然早就闻知长崎出岛上的荷兰商馆,但2007年3月初访长崎时,在主人的陪同下,除了格拉巴庭园之外,只是去看了孔庙、福建会馆等几个与中国相关的人文古迹。2024年得以再度造访长崎,圆了这一夙愿。6月中旬,已是初夏季节,但海风吹来,拂去了白昼的些许炎热。我们从汇丰银行长崎支店一路向北,漫走了大约半小时,来到了2016年重建完毕的出岛荷兰商馆最西边的水门,门前立有一根石柱,上面用汉字镌刻着“史迹”。不过这里不可入内,要走过中岛川(一条多半是蓝莹莹海水的河)上的大桥,从北岸就可隔河清晰地望见复建的荷兰商馆面影。

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正式实行锁国政策,但允许中国和新教国家荷兰在长崎一隅与中国做有限的贸易。荷兰人是被局限在有一座木桥与陆地相连的出岛上与日本做贸易的。出岛上的荷兰商馆,占地13000平方米。官府在联络桥边设立了检查站,未经准许,禁止桥两边的人自由出入。荷兰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是1616年烧制成功的瓷器(西方人称为“伊万里烧”),由于清政府后来的海禁,日本的瓷器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坐上飞机,飞越太平洋,去往美国生活。而那一刻,我在上海的“家”,便被永远地留在了过去。可我却常在夜深人静时,怀念远在上海的那幢老房子,怀念落地窗外的玉兰树,怀念屋檐下飘散的花香和赤脚走在那老房子打蜡地板上所发出的吱吱呀呀。我常常对自己说:“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上海。”我的“家”,始终在黄

树上的女人

李西闽

不久就看到来自村庄影影绰绰的火把,村里人赶来了。那些生命力旺盛的火把终究没有挽回女人的生命。当人群围拢过来,哭声漫过夜色的时候,我躲到了一旁,没有人理睬我,人们为女人的死沉痛,我也为女人的死沉痛,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漫出来,无声无息。

我知道那女人是我们村庄里最美的小媳妇。她会唱很多好听的歌,她还会把花儿插在头发上。女人死后埋在重山里,我没有去看她的坟墓,我不知道她的坟头是不是一年四季开满野花。我只是在许多日子里,面对那棵老樟树黯然神伤。树是常绿的,还有新枝悄然探出,让我产生许多想象,那新枝难道是女人的灵魂和肉体变的?人永远是活在新鲜空气中的精灵,无论生或者死。

不消逝的电波》收束全篇时,一份深沉的敬意促使我向郑大圣总导演建议融入孙道临老师那穿越时空的声音。在混录棚绝对寂静的黑暗中,当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从饱

在上海“爱”电影

崔轶

含岁月底噪的老胶片上骤然迸发,其声铿锵如金石坠地,其情浑厚似裂帛穿云,瞬间撕开了尘封数十载的帷幕。那声音带着前辈艺术家全部的赤诚与生命重量,滚烫地烙在当下。这岂止是一句台词?这分明是一束沉甸甸的薪火,从时光深处递来,灼热地传递到我们这一代光影探索者的掌心。作为影迷我要向经典影片致敬、作为青年导演我继承上海电影的传统,这是我的一点私心,也是我向上海这座电影之城表达一份影像情书!

你是否会像我漫步在上海

长崎荷兰商馆

徐静波

填补了中国的空白,在欧洲备受推崇。荷兰人也在贸易的同时,将非宗教的书籍输入日本,带来了欧洲的新知识,在整个江户时期,出岛成了沟通东西方的重要津梁。随着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败,出岛的地位渐趋下降,到了近代日本对外打开国门后,荷兰商馆遭到了废除,原地改成了领事馆。19世纪末,日本大举进行港口建设,继续填海造地,最后连出岛本身也消失了。近年日本重新检视历史的遗迹,展开了修复工程,复原了昔日的房屋,2017年11月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开放仪式。

买了门票进入里面,眼前展现的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景观,建筑多呈两层,乍一看,似乎是一条江户时期的老街,完全是木材建造,外貌是浅黑色中透出褐色甚至是木材的原色,绝不是铮亮簇新的新构,尽可能体现出一些色彩剥落漫漫的沧桑感,黑褐色的瓦顶,向前伸出的东方式的屋檐,日本风的外部是细长木

年轻的时候,常常喜欢听一首歌。那时觉得远方多么诱人。多年过去,再听起那熟悉的旋律,眼睛里湿湿的,就如刚剥开一颗洋葱。

不久就看到来自村庄影影绰绰的火把,村里人赶来了。那些生命力旺盛的火把终究没有挽回女人的生命。当人群围拢过来,哭声漫过夜色的时候,我躲到了一旁,没有人理睬我,人们为女人的死沉痛,我也为女人的死沉痛,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漫出来,无声无息。

我知道那女人是我们村庄里最美的小媳妇。她会唱很多好听的歌,她还会把花儿插在头发上。女人死后埋在重山里,我没有去看她的坟墓,我不知道她的坟头是不是一年四季开满野花。我只是在许多日子里,面对那棵老樟树黯然神伤。树是常绿的,还有新枝悄然探出,让我产生许多想象,那新枝难道是女人的灵魂和肉体变的?人永远是活在新鲜空气中的精灵,无论生或者死。

的街头时,脚步常常不自觉地放慢、放轻。因为不知在哪个瞬间,就会与记忆胶片上的某个经典场面悄然擦肩。梧桐筛下的碎金阳光里,恍惚听到《马路天使》里周璇清亮的歌声就躲在枕流公寓里;外滩海关钟声沉郁响起,仿佛《子夜》中吴荪甫沉重的叹息仍在江风中飘荡;苏州河曾经浑浊的水波,倒映着《苏州河》里马达与美美破碎又执拗的爱情光影,时至今日,清澈的苏州河水又会孕育出怎样的《爱情神话》呢?而下一个街角的转弯处,不经意地抬头,常德公寓的流线型阳台便撞入眼帘——那是张爱玲笔下苍凉世界的入口,仿佛一推门,便能看见王佳芝在幽暗的楼梯转角,身影被昏黄拉得细长而孤寂。再几步,武康大楼如巨轮般的巍峨轮廓矗立于霞光或暮色之中,那雕花的窗棂后,曾有过郑君里案头彻夜不熄的灯火,回响过孙道临诵读台词的清朗嗓音,也萦绕过王

栅栏的纸糊的格子窗。却有两幢,有向外突出的类似阳台的大窗户,用玻璃镶嵌,窗棂涂了鲜亮的浅绿色,据说这些油漆和玻璃是专程从欧洲运来的,在整体偏暗的房屋外面,带来了新异的欧风。房屋的内部,也是榻榻米的地面,但有书桌和长凳,这是日本近代之前所完全没有的。更多的空间,则做成了一般的陈列室,有一艘做工精致的荷兰商船模型,木制的三桅帆船,甲板上的两侧,有两排舷窗,比看到的遭唐船模型大多了,当年的航线,毕竟是要向南绕过好望角再进入印度洋,单程的航行也要好几个月,船体若不坚固,很可能被汹涌的海浪击毁。由荷兰人带来的书籍,日本人获得了人体解剖和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在江户中期以后,形成了以荷兰为媒介连接欧洲新知识的“兰学”,还有专门传授“兰学”的私塾,比如大阪的绪方洪庵,在日本国门被打开之前,知识人阶级对西方并不隔膜。

复建的出岛荷兰商馆,连同西边吹来的海风,撩起了人们对于江户时期南蛮风情(当年日本人将从西南面过来的洋人称为“南蛮”)的种种思绪。

前不久,在一家新开的商场内看到商户展出的一辆28吋自行车,立马孩童般地做了个骑行的动作。多少年没骑过28吋自行车了呀。28吋自行车又称二八大杠自行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市场上的“奢侈品”,要想拥有一辆,不仅要自行车券和钱,而且还得排队等号,商场里小半年才进几辆车;要是哪家有辆28吋自行车,可有面子了。

初识28吋自行车,还得从去崇明务农说起,那时上海市区去崇明岛,只有两条线,一条吴淞到堡镇,另一条十六铺到南门。当时,堡镇码头十分简陋,船靠码头后,走过一条长长的引桥,便来到了用煤渣铺成的“广场”,“广场”上停有许多28吋自行车,它们停在这等候着上岸的人当“车夫”。因当年崇明公交客运站并不设在码头,而是离码头有二三站路的堡镇镇上,人们上了岸后,靠接驳车转运至客运站,但接驳车少得可怜,远远满足不了蜂拥而至的人,挤不上接驳车的人,无奈只得出钱坐上28吋自行车后座,一路向公交客运站骑去。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是那个年代中国家庭的“三大件”,而28吋自行车是当时市场上最流行的款式之一,行将结婚的男青年也以拥有一辆28吋自行车而自豪。

回城工作后,作为教师的母亲手气好,在单位抽奖中,得到了一张自行车券,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辆28吋自行车。如今,人们出行的方式已多样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28吋自行车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退出了市场,骑车载人载物已成为过去式,人们想看到28吋自行车,只能去博物馆或商场里看旧物件的摆设了。



夜光杯

文娟水袖轻扬时的低吟浅唱。在网红街道的书店中你或许会巧遇到桑弧导演之子——李亦中关于电影的讲座。继续前行,在车水马龙的喧嚣边缘,电通公司的旧址沉默着,国歌诞生的地方也沉默着。那朴拙的砖墙,无言的基石之下,分明还搏动着当年那些滚烫的青春、激越的呐喊和视死如归的信仰。时光的尘埃在这里落定,却又被每一个知晓故事的脚步重新搅动、飞扬。行走在这座电影之城,每一次不经意的驻足与回眸,都像在银幕上精心设计的蒙太奇转场。

在上海“爱”电影!它是一个永恒的邀约,邀我们以全部的热爱与虔诚,一次又一次,纵身跃入那由万千光影织就的、浩瀚无垠又生生不息的人间长卷中。

今年有部电影是我一定要看的,那就是陈逸飞导演的《人约黄昏》。

十日谈

影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